“两个结合”的生成向度：文本、读者、实践

邱　程

（1.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241002；
2.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州，213164）

摘　要：文本、读者、实践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三位一体”逻辑准则。这三个向度有效回答了“两个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阐释了“两个结合”的深层意蕴、内在逻辑和实践指向。文本向度保证了“两个结合”的客观性、达意性和流动性；读者向度保证“两个结合”克服先入之见，走向视域融合，完成意义创生；实践向度凸出了“两个结合”的根本指向和问题导向。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新发展、新动向、新格局，“两个结合”应借助经典诠释把握基本原理，借助视域融合完成意义创生，借助共性问题弥合时间距离，既要坚守真理本色，又要凸显中国特色，还要保持理论底色，全方位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诠释学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5-0009-08

收稿日期：2025-0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KS079）：网络空间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生成机理与实践策略研究。

作者简介：邱　程（1987-），男，江苏睢宁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5.013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两个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③]，是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这些论述暗含一个前置结论：“两个结合”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目前，学术界研究了“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现实逻辑。但是，现有研究无法充分解答一个前提性追问：为什么“两个结合”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本文试图运用诠释学理论，从文本、读者、实践三重向度回答“为什么结合、怎样结合，结合成什么”的问题，阐释“两个结合”的深层意蕴、内在逻辑和前置结论，回应“体用之争、知行之争、标准之争、时空之争”，构建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三位一体”逻辑准则。

一、文本向度：借助经典诠释把握基本原理，设定“两个结合”的思想源头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之日算起，马克思主义历经了170余年。在此期间，人们一直在寻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④]。一些人基于自身立场，给马克思主义冠了各种各样的前缀，诠释出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观性、片面性解读。因此，“两个结合”必须起始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回溯思想源头，回归原理本真，克服主观主义倾向，确保“两个结合”的产物不变质，不走样。在此，我们遇到三个亟待回答的疑问：为什么必须回到经典文本？经典文本的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页。

②齐卫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的新认识》，《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2期。

③李毅：《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

④顾海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理论·实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00页。

含义是否符合作者原意？是否要全盘接受经典文本的论述？

（一）经典文本的客观性

我们要刻画马克思主义的原像，就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和作者原意。但是，这种回归必须具有明确的选择性。我们要回归经典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态度和真理精神。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如下现象：所有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流派都号称回归马克思，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诠释对象。但是，不同流派回归的结果、诠释的结论却千差万别，甚至“标新立异地追踪某些国外学派来创立新体系”①。这些学术流派、研究范式、代表人物颇具号召力、迷惑力、煽动力。由此可知，尽管“回到马克思”② 这一口号仍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然而，它依然无法帮助我们判定何为原汁原味的、具有唯一性的马克思主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学术观点的分歧；其二，诠释对象的差异即文本和作者的差异。观点的分歧属于正常的学术争论范围，有益于推进学术研究和发展。文本和作者的差异则由选择的主观性导致。马克思主义文本包含论文、专著、手稿、书信、笔记、报刊文章、演讲稿、语录、传记、文件、回忆录、物件等各种类型。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也包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的诠释者。文本类型差异和作者派别差异必然导致不同结论甚至错误结论。为了消除文本差异，摆脱各流派的束缚，我们必须直接回归经典作家，回归经典作家创作的经典文本，回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源泉，回到整体马克思。③ 这是新时代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准则，是推进“两个结合”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个魂，诠释的结论可能歪曲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抛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权威诠释”，摆脱这些“权威诠释”设定的思维模式，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直接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④。经典文本能否被激活，能否产生新的意义，依赖于新的生命体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⑤ 我们要在自身体验和经典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构建双向互动的思想循环，重新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让经典继续成为社会生活的指南。

（二）经典文本的达意性

“两个结合”必须回到经典文本。人们或许会追问：经典文本的内容是否代表经典作家的原意？文本含义和作者原意的一致性问题是方法论诠释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方法论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保罗·利科尔直接把文本当作诠释的核心。他认为，书写的文本和口语存在显著差异性。文本生成之后，便摆脱了作者的意图，获得了自主性，“本文所指的意义和作者的意思不再一致了”⑥。美国诠释学家赫施指出了保罗·利科尔的逻辑误区，严格区分了文本的含义和意义。在赫施看来，文本的含义和文本的意义是两个不同概念，文本的含义是固定不变的，“发生变化的是文本对于作者的意义”⑦。文本的含义由作者创设，文本的意义则根据读者而变化。其实，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平衡、对等状态。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关联性明显强于其他几组关系。文本是作者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客观载体，作者和文本之间具有天然的粘连关系，作者意图与文本紧密关联。我们不能否认作者原意和文本含义具有高度一致性。表达思想和意图是作者创作文本的原出动力。文本传承作者关于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延续文化传统。文本是“读者把握作者意图和作者表达原意的媒介”⑧，是读者和作者跨时空交流的关键点，是理解和解释的核心对象和前提条件。

---

①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四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页。

③郝敬之：《回到整体马克思》，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④彭启福：《理解、解释与文化——诠释学方法论及其应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4页。

⑤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⑥[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

⑦Hirsc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e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 8.

⑧彭启福：《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方法论诠释学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期望“通过受控制的、方法论的思考”[①] 解读文本，挖掘文本的含义，追寻作者原意。换而言之，追求文本蕴藏的意图和思想是读者理解活动的重要目标。作者原意和文本含义支配整个理解过程。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含义和经典作家的原意具有高度一致性。新时代诠释马克思主义，不能人为割裂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之间的粘连关系，不能人为制造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经典文本是经典作家表达原意的载体，是理解经典作家原意的媒介。[②] 理解经典作家和理解经典文本具有同一性。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表达，是“两个结合”的思想源头。

（三）经典文本的流动性

是否要全盘接受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的论述？正如前文所述，“两个结合”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这种回归不仅包含内容本身，还包含对待这些内容的态度和精神。其中，如何区别对待一般原理和具体措施是首要问题。《共产党宣言〈序言〉》详细回答了这个问题，厘清了“一般原理”和“具体措施”的区别。随着时代发展变迁，《共产党宣言》描述的场景一直遭受多方质疑。到了18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态和无产阶级运动的起伏过程进一步挑战《共产党宣言》的结论。然而，“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③]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未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规律终将促使“两个必然”成为现实。一个细小的历史片段并不会改变人类阶级斗争的运动规律。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坦率地否定了具体措施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更科学、更严谨地阐释《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他们指出，面对25年的重大变化，“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和真理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⑤]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应该随着时代发展。虽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但是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提出的诸多具体措施已经被时代否定，失去了参考价值。新时代、新问题、新发展、新动向，我们应该领悟一般原理和具体措施的差异性，决不能重走教条主义的道路。

二、读者向度：借助视域融合完成意义创生，设定“两个结合”的内生动力

文本向度设定了“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两个结合”不能走向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不能抛弃科学的指导思想。否则，“两个结合”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本之源。然而，“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⑥] 如果仅仅以文本为中心诠释马克思主义，必将走向绝对主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中，王明等人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种单一向度的诠释模式不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且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⑦]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只有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功效。我们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⑧]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中国人民是解释、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对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理解前结构、先入之见、主体视域。为此，“两个结合”还必须遵循作者向度，克服文本诠释的教条主义倾向，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

（一）基于理解前结构的先入之见

中国人民特殊的理解前结构——先入之见是“两个结合”的出场语境。在方法论诠释学看来，读者要

---

①[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7页。

②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第6页。

⑤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⑧《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3页。

尽量控制个人主观因素，采取心理移情、重新体验等方法理解文本、理解作者。然而，本体论诠释学重新定义了理解和解释之间的关系。“领会在解释中并不成为别的东西，而是成为他自身。在生存论上，解释植根于领会，而不是领会生自解释。”① 由此，理解和解释变成了此在的生存方式，追寻作者原意不再是主要任务。本体论诠释学认为，读者根本不可能完全摆脱自身经历，达到和作者同样的状态。海德格尔认为，理解和解释不可能凭空产生，总基于特定的前结构。前结构由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三个要素构成。“前有”就是此在置身的现实经历、政治环境、经济条件、文化传统等社会背景。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之前，此在已经被“前有”以隐蔽地方式先行占有。“前有”为此在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和充分的空间。“前见”就是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前置立场或视角，主要包括语言、观念及其运用方式。此在的理解和解释活动必须依赖特定的语言、观念。因此，此在必然受制于蕴含在语言和观念中的见解，“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视见之中”②。由此可知，前见是理解和解释活动的起点或出发点。“前把握”就是此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依靠的概念方式。此在可以寻找自己的概念方式，也可以进入他者的概念方式。不管选择哪种概念方式，此在理解和解释活动必然受制于某种概念方式。综上所述，此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主要受制于“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从始至终，理解和解释活动都不是对既定事物无前提的把握，不是一种完全受自我控制的认知行为，必然带有此在的“先入之见”。海德格尔建立了理解和前理解之间的诠释学循环。任何理解都奠基于前理解，理解和前理解之间的循环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所处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经济条件、文化传统、语言体系、思维方式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异。“两个结合”决不能忽视中国人民的“前有”“前见”和“前把握”即“先入之见”。先入之见既是无法回避的先决条件，又是必须深思的现实语境。中国人民诠释马克思主义，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关照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历史进程，适应中国话语体系，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国发展阶段。

（二）基于先入之见的视域融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人民的主体视域实现双向互动，完成基于先入之见的视域融合。由本体论诠释学的论证可得出以下结论：先入之见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理解和解释活动的障碍，而是主体（此在）的存在方式。“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③ 文本诠释的目的不仅是寻求作者原意，而且是读者自身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因此，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核心不再是追寻作者原意或者重建作者思想，而是沟通历史真理与现实生命。理解和解释活动要“以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去思考并以此追寻历史的客观性。”④ 读者要从自身所处的现实语境出发解读文本，与文本、作者实现思维性沟通，引出文本意义。读者成为决定文本意义的关键性因素。实际上，先入之见就是读者开展理解和解释活动之前具备的视域。⑤ 它与人的主观因素紧密关联，又不完全受制于人的主观因素。伽达默尔认为，读者既不可能彻底摆脱自身视域的限制，又不需要完全基于文本和作者的视域。在他看来，理解和解释活动是读者和作者视域融合的过程，诠释学对话则是完成视域融合的重要一环。理解和解释需要作者和读者以文本为中介开展一场特殊的对话。这是一场双方以不同方式在场的对话。作者以固化的文本在场，读者则是现实活动的人。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成为二者对话的主要依靠和关键要素。二者不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先入之见促使读者由倾听者变成对话的主体之一，创造了视域融合的现实可能性。历史上，我们曾经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绝对真理性，完全忽视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和特殊视域，剥夺了读者发言的权利，片面强调倾听的义务，导致教条主义错误。“马克思从来不撇开人的社会历史性来抽象地讨论认识论问题。”⑥ 其实，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人民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完成双向对话、视域融合的过程。“两个结合”的效果和结果受制于对话的效果。正如前

①②[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73页，第175页。

③[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21页。

④严平：《伽达默尔集》，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⑤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8页。

⑥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文所述，先入之见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我们不仅要促进对话，而且要提升对话效果，实现中国视域和经典作家的视域互相嵌入，努力提升视域融合度。

（三）基于视域融合的意义创生

视域融合是一个双向互动，双向影响、双向融合和双向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背景是先入之见，方法是视域融合，结果则是意义创生或话语创新。意义创生是读者和作者沟通的重要目的，是读者（此在）体现存在意义的重要手段。读者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总是指向特定的文本和作者。① 这一过程并不是作者无意识的行为，而与作者的主观性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理解和解释就是读者根据自身的历史性解读文本，借助视域融合达到意义创生的过程。正如前文所述，根据美国诠释学家赫施的观点，文本的含义是确定不变的，文本的意义却具有流动性。伽达默尔强调："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② 诠释绝不是简单地复刻，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在下一步论述之前，我们需要详细区分"理解"和"解释"这两个概念。通常情况下，理解和解释是一体的，是一个贯通的过程。但是，在区分文本含义和文本意义层面，"理解"和"解释"则有明显差别。理解主要指向作者原意和文本含义，是一种以作者和文本为中心的活动。解释则主要指向读者视域和文本意义，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意义创生行为。解释活动或意义创生行为常常涉及话语体系转换。"所有解释在某一点上都求助于非属原文本的范畴和概念"③。读者的解释活动必然契合自己所处时代的话语。换而言之，每个时代都有一套专属的话语体系和解释方法。解释者必须关注听众语言习惯、风俗传统、地理区域的差别。由于任务不同、时代不同、听众不同，解释总是具有多元性。"文本总是被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境遇下阅读，无限地开放新意义。"④ 在阐述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和选择权。解释者具有选择解释对象、内容和方式的自主权。但是，任何单个解释并不是肆意发挥，必须基于文本的整体含义。"解释体现了读者的选择性，但是仍然受作者意图和文本含义限制"⑤。总而言之，一切理解都要以作者和文本为出发点，一切解释则因时因地而变。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关照中国发展的实际需求，这是"两个结合"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推动"两个结合"，创生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意义创生至少包含话语转换和概念生成两个部分。话语转换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互补、改造、革新，完成"中国化和化中国"⑥ 进程，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概念生成就是形成具备马克思主义血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理论体系。依靠中国话语体系、创生性概念、创生性理论体系沟通人民群众的心灵，提升人民群众的认同感，让其成为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不断夯实"两个结合"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实践向度：借助共性问题弥合时间距离，设定"两个结合"的现实关照

文本向度强调思想源头的重要意义，作者向度强调了现实语境的重要价值。然而，我们不能止步于这两个层面。诠释的目的不是理解和解释，而是实际应用和具体实践。⑦ 根据前文阐述，"两个结合"既不能偏向文本，也不能完全倒向读者。由此，人们可能又产生新的疑惑：如何平衡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沟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人民的主体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为了彻底消除人们的疑惑，"两个结合"还要坚持实践向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⑧ 实践是沟通文本和读者的中介，是连接思想源头和现实语境的桥梁，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一旦有技

---

①张汝伦：《从文本理解看释义学的实践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③Hirsc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136.

④傅永军：《文本概念及其特征：基于哲学诠释学的一种理解》，《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⑤朱立元：《略论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一个诠释学视角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⑥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

⑦崔延强、黄其洪、张永红：《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6页。

⑧甄占民：《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7页。

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① 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不同时代需要回答不同课题，需要开展不同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也要时代化，借助共性问题弥合时空距离，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

（一）实践应用是推进“两个结合”的根本指向

应用性是诠释的真正本质，是文本意义创生和流动的关键环节。在十八世纪，虔诚派诠释学家兰巴赫等人就认为诠释包含三种技巧：理解、解释、应用。在虔诚派诠释学家看来，理解、解释和应用彼此相互独立，依次递进。② 方法论诠释学则把应用当作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组成部分。伽达默尔认为：“应用，正如理解和解释一样，同样是诠释学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③ 应用并不是发生在理解和解释结束之后，而是理解和解释过程不可或缺的要素。换而言之，理解和解释已经内在地蕴含了应用的成分，理解和解释本身就是一种应用。“理解乃是把某种普遍东西应用于某个个别具体情况的特殊事例。”④ 应用不是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偶然成分或者附属物，而是规定和约束理解和解释活动的要素，是实现真正理解和解释的驱动力。关联文本和读者的诠释语境是理解和解释的前提条件。在此，读者不但需要倾听文本的诉说，掌握文本的含义，而且要把普遍的理论和知识应用于具体情境，并为文本创生崭新的意义。由此，应用具有双重指向性：现时态生活和文本本身。理解和解释文本就是一场双向对话，是读者和文本作者的良性互动。这种对话和互动促进了文本意义的流动，改变了读者生存状态，推动了应用过程。“应用就不仅仅是对某种理解的‘应用’，它恰恰是理解本身的真正核心。”⑤ 所以，应用性促进理解和解释，是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厘清诠释的应用性问题，有助于解读诠释的实践性。实践过程就是理解和解释的展开过程，理解和解释是实践的一个核心要素。在哲学反思层面，理解、解释和实践也具有同一性。它们需要解决一个共同问题：普遍东西和特殊东西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⑥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深化。“两个结合”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和时代特征。这种实践指向和时代特征不仅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更体现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新挑战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⑦ 我们要有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创新精神，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也要注重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这种创新性和适应性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了生命力和活力。

（二）问题意识是引导“实践应用”的关键因素

在文本所代表的“普遍的东西”和读者所代表的“特殊的东西”之间，带着问题意识理解和解释文本就显得非常重要。问题是连接文本的普遍性和读者的特殊性的中介。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获得诠释经验需要提出问题。正如前文所述，诠释（理解、解释和应用）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双向对话，存在读者和文本之间的“问—答”结构。在这个“问—答”结构中，问题引出了被问及的东西和答案，“效果历史”⑧ 开始发挥作用，文本获得创生性意义。问题具有导向性作用，“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⑨，制约答案的方向和质量。问题必须基于提问者自身特殊的诠释情境，否则，问题就会失去方向性和针对性。真正的诠释不仅把握普遍性知识，而且要把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应用于特殊性实践。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一些诠释者致力于追寻作者原意或文本的语义学含义，未从应用性和实践性角度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最终犯了教

---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②彭启福：《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

③④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95页，第400页，第466页。

⑤[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14页。

⑥《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⑧亓光：《政治诠释学视域中的公正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2页。

条主义或本本主义错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割裂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曾经造成了许多重大的失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问题具有先导性作用，是时代发展的真实声音。① 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文本置入中国的诠释情境，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建构问题。我们只有真正听到时代声音，找准时代问题，找到真实问题，才能给出最合适、最有效的答案，才能解决最主要的矛盾，才能切实破解发展面临的瓶颈。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指导实践，解决真正的问题。我们要“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为中心，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②。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过程中，中国遇到的问题必将更加复杂，解决问题的难度必将持续增大。我们要坚定斗争意志，持续增强问题意识，寻找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关系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突出问题等。

（三）共性问题是弥合“时间距离”的重要支点

时间距离影响理解、解释和应用的重要变量。施莱尔马赫认为时间距离是导致误解的首要因素。“每一种理解行动都是讲话行动的反面，因为我们必须把握那种作为话语基础的思想。”③ 时间距离淡化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联系，导致作者和读者处于不同的传统、语言、文化环境。作为一种避免误解的艺术，诠释学努力寻找消除时间距离的方法。从物理学角度而言，时间具有不可逆性质。施莱尔马赫注重时间的间断性，寄希望于心理学方法，“正确的解释需要语法解释和心理学解释的结合”④。伽达默尔则强调时间的连续性，认为“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⑤ 。时间距离提供了创造性解释的可能性，致使读者的解释不再完全受制于作者和文本。时间距离是意义的过滤器和生长点，既不是简单地隔离作者和读者，也不是刻板地连接作者和读者，而是平衡作者和读者，促进文本意义不断流动。文本的实际意义不仅来自作者的原始处境，也来自读者的现实处境。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世纪40年代，已经走过百余年发展历程。时间距离导致当代诠释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身处不同的诠释情境。这给我们把握作者原意创设了困难。然而，我们要找到当代诠释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面临的共性问题：人类社会如何发展？未来世界如何变化？我们不仅要走进历史，还要走出历史，以这些共性问题弥合时间距离。马克思主义要展现思想魅力，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⑥ 一是回答中国之问。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贫穷走向富裕。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功之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⑦ 二是回答世界之问。中国共产党洞察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回应全世界人民共同关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选择”⑧ ，增进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三是回答人民之问。中国共产党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坚定认同、人民共同喜爱、人民易于掌握、人民自觉践行的真理，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四是回答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发扬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以英勇无畏的斗争意志继续攻坚克难，持续探索解决民生问题、党建问题、发展问题、国际问题、人类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结　语

理论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和概括，是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工具。实践是对理论的具体应用和检验，是获取和理解知识的途径。二者是哲学思考的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探索人类精神世

---

①顾海良：《坚持问题导向的道理和哲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②刘建军：《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③④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49页，第55页。

⑤[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4页。

⑥肖贵清、李云峰：《实现“两个结合”与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4期。

⑦《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03页。

⑧张占斌、王海燕、毕照卿：《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阶段、文明形态和时代意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4期。

界和物质世界的重要指南针。具有完备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适应新时代环境的开放性思想。就此而言，我们应基于新时代、新问题、新发展、新动向，构建“文本—读者—实践”三位一体逻辑准则，全方位理解、解释、应用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立场，而且要积极发展和丰富这一伟大思想，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社会。“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不仅革新了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而且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积极面对新的实践挑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两个结合”，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提出前瞻性和科学性的解决方案。

The Generative Dimension of “Two Combinations”: Text, Reader and Practice

QIU Cheng

(1.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Changzhou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Text, reader, and practice constitute the “trinity” of logical criteria for interpreting Marxism. These three dimensions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necessity, feasibility, and actualization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elucidating their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The textual dimension ensures the objectivity, coherence, and continuity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The reader-oriented approach guarantees that the “two combinations” transcend preconceived notions, achieve horizon integration, and facilitate meaning creation.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underscores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and problem-focused nature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era characterized by emerging challenges, developments, trends, and patterns, the “two combinations” should leverag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to grasp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utilize horizon integration to foster meaning creation, and bridge temporal distances through shared issue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adheres to the essence of truth but also highligh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maintaining a robust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reby comprehensively addressing questions pertinent to China, the world, the people, and the times.

Key words: Marxism; sinicization; modernization; the “two combinations”; hermeneutics

[责任编辑　如初]